



◎纪念

此事虽小,可以谕大

——董治安先生与《高亨著作集林》

马庆洲



资料图片

转眼，董治安老师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。十年来，董老师的音容笑貌时常浮在眼前，仿佛不曾远去，他的谆谆教诲也言犹在耳，历久弥新。董老师仙逝后，我虽然也写了几篇小文，抒发心中的哀痛和思念，但其时心绪难平，且年纪相对较轻，对老师为人为学的理解，不免肤浅。而今，年齿加长，董老师在我心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丰满，再回想老师的言谈举止，更深深地感到，董老师胸怀洒落，如光风霁月，确有古君子之风，是真正的学者，是吾辈最可亲近的学习榜样。

在董老师身边的二十余年时间里，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，都得到过老师的悉心关怀和指点，学到很多读书、做人的道理，有无数美好的记忆。篇幅所限，这里仅回顾一下《高亨著作集林》出版过程中感触最深的片段，作为对老师的一份怀念。

董老师的欣慰与遗憾

2001年夏天，我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工作。工作伊始，很想做几大部头的书，自己所学为古典文学，自然而然地便想到清华国学院，想到国学院师生那些不朽的著作。2001年11月8日，董老师来京开会，参加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，住北大勺园6号楼。晚9时，我前往拜望，谈话间我提起有意出版高亨先生文集之事。当时，董老师还有些犹豫。主要顾虑是，高先生的著作出版时间跨度大，版权相对复杂。但他也一再说，“做起来倒是个很好的东西”，“高先生有十七本书呢”，同时还提到手头有在日本发现的高先生的《庄子今笺》一书，这是以前未见过的。

事实上，董老师回济南后即着手准备，对高先生著作的版权进行了一些调查，也征询高先生家属的意见并得到支持。一周之后，董老师打电话给我，告知相关情况，说可以做起来了。此后，董老师便正式开始了高先生文集汇纂的工作，从搜集底本，到处理版权，再到文字的处理等，事无巨细，都亲力亲为。由于所收著作底本有繁体、有简体，且都是重新录入，编校工作量非常大，董老师组织王承略、刘心明、刘保贞等七八人成立“编辑校对组”，保证了工作的进度和文集的质量。董老师对所收著作

20世纪60年代初，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室讨论教师培养计划。右起：陆侃如、高亨、冯沅君、董治安、袁世硕。

资料图片

个别文字的修订或技术上的处理，如异体字的处理等，都逐一把关，做最终裁定。董老师还撰写了全书的《编纂说明》和每书的《题解》，这些文字虽不算长，但尺幅千里，更需大匠运斤，颇耗心力。

对于书名，董老师也颇费了一番思量。2002年3月31日下午，我和承略兄一起到董老师家中讨论文集的编辑事宜，谈到书名时，董师认为“文集”用得太多、太滥，此次收集，只收高先生的学术类著作，最好叫“集林”。在董老师看来，王国维先生有《观堂集林》，高先生的文集也以“集林”为名，可以体现一种学术的传承。

《集林》前期编校工作耗时两年多，每种书都反复校对了三四遍。直到付印前不久，董老师还放心不下，2004年12月底，利用到北大古委会开会之便，让我把《集林》封面小样及文前页等送过去，还要再看一下。在紧张的会议期间，董老师审核了这些样张，纠正了几处错误。

经过三年艰苦的努力，编辑工作基本告竣，很快就可付梓了。2005年2月13日，是正月初五，我去董老师家中拜年，汇报了《集林》的出版进度，并感慨说：“书出来就完成任务了！”董老师闻言则道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事后，我想董老师是让我思想上放松一点儿，不要把事情变成负担吧。

2005年春夏之际，十卷本《高亨著作集林》终于印制完工。随后，我又邀请董老师举办一个《集林》的出版研讨会。董老师对会议名称、时间、参会人员等，做了精心的考虑和指导。2005年6月20日，清华大学出版社与山天文学院、儒学高等研究院在清华举行了“《高亨著作集林》出版暨学术座谈会”，除山大老师外，庞朴、李学勤、安平秋、葛兆光

等诸多著名学者出席，汤一介先生发来书面发言。会上，董老师不无动情地说：“如今，皇皇十卷、堪称精美的《高亨著作集林》得以在清华大学出版社隆重出版，可以说圆了我一个多年的梦。”此话向来言辞谨慎的董老师口中说出，我感到很不寻常，分量极重，闻听之下的震动，今日记忆犹新。毫无疑问，将高先生的著作结集出版是董老师深藏已久的心愿。

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《集林》没有收录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而只作“存目”处理。这完全是由于我当时的畏难情绪所致。《古字通假会典》是高深的专业工具书，涉及很多僻字，当时排版技术不够完善，清华社又非专业古籍社，自付难以驾驭，所以我自作主张，没有纳入这本书。当时，董老师也没有说什么，但在后来的聊天中，董老师还是提出，《集林》没有收录《古字通假会典》，多少还是有些遗憾。每每念及此事，我便后悔不已，至今难以释怀。

鉴于《集林》部头较大，为方便读者购买、使用，后来，我又以“高亨著作丛刊”之名，将高先生著作单行出版。这件事也得到董老师的大力支持。尤其难忘的是，2011年11月10日，董老师给我打电话，欣喜地告知，又发现几种高亨先生手稿，较有价值，商量可否纳入其中出版。其时“子海工程”正在进行中，这几种书便作为《子海特辑》以《高亨子学研究未刊稿》之名在凤凰出版社出版了。从这些事中，我也亲身感受到董老师对高先生著作的珍视，哪怕片言只语，也视若拱璧，想办法使其集为一编，化身千百，以免再有遗珠之憾。

董老师与高先生的师生情，已广为人知，成为学界佳话。董老师对高先生文字的珍视、对高先生文集倾注的心血，算是他们之间师生情笃的又一佐证吧。

一语之中见“分寸”

凡是真正受过董老师教诲的学生，大概都不会忘记“分寸感”这个词。王洲明老师在纪念董老师的文章中，就特别提到董老师的话——“任何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都要有分寸感”，并总结说：“通过自己多少年来的研究实践才逐渐地体会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追求分寸就是追求严谨，也就是追求学术研究的那种科学性。”（《厚积薄发 宏阔严谨——试论董治安先生的治学风格 and 特点》，载《文史哲》，2013年第6期）

在董老师给予我的教导中，最令我难忘而且一直奉为信条的，也是“分寸感”这个三字箴言。要把握好分寸，把话说到位，但不说过头话，这是董老师在指导我们写作时经常强调的一点。其实，这又何尝不是做人的原则呢？在编辑高先生文集的过程中，董老师在如何给高先生冠衔的问题上，给我上了一堂“分寸感”的现场课。《集林》附有一篇《高亨先生传略》，文中需要给高先生“戴帽”，董老师为此颇费了一番思量。一来高先生是学术上的大家，学界有公论。二来作为高先生的学术继承人，董老师又不愿有借师自重之嫌。所以，寥寥数字，董老师反复考虑，沉吟再三，最后只称高先生为“我国国学研究与古文献整理的著名学者”。在审阅我所撰《集林》相关宣传材料时，董老师也定调，称高先生为“著名文史研究专家”。这与时下动辄“大师”帽子乱飞的浮躁现象，形成鲜明对比，高下立判。

董老师远去，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回想。在老师化鹤十周年的日子里，我想用一句话来表达对老师深深的敬意和绵绵的思念：董老师，您的儒风道骨，您的君子风范，是我终身步趋的楷模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！

（作者系清华大学出版社编审）

◎审美课堂

艺术作品在中共党史馆展览中的美育功能

杨艳喆

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仅一年，其承载的全景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奋斗精神风貌，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、顽强奋斗伟大历程的功能就已得到充分体现，被称为展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恢弘精神殿堂。

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效，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，亲自谋划、亲自决策、亲自部署的结果。整个展览高屋建瓴、浓墨重彩，较好地贯彻了总书记系列指示与要求。从策展、布展角度看，大手笔与小细节主次分明又有机相融，各种展示手段悉数登场，可圈可点外颇多。其中，文艺作品的出色运用格外突出。

党史馆充分运用了绘画、雕塑、音乐、影视及数字技术等艺术形式作为重要展示手段，展出了大量经过历史检验的经典作品与最新佳作，在引导观众直观生动体悟历史、树立社会主义审美价值取向、增强理想信念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一、真实反映历史，准确传递信息，增强信念自信

由于受当时社会条件等所限，党的历史上一些早期重要历史活动、事件都没有照片或影像资料留存，这虽是遗憾，却也为文艺作品创新提供了空间。但区别于一般文艺作品，党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必须从尊重历史、校准史实出发。事件是作品之形，真实是作品之魂。形魂兼备之作才是优秀的党史题材佳作。

这样的佳作在党史馆中并不鲜见，油画《启航》即是代表之一。《启航》反映了中共一大最后一天，代表们在嘉兴南湖从小船到大船登船与会的瞬间。何红舟、黄发祥两位画家采用写实主义手法，通过反复查证史料，确认会议召开

期间是阴天，遂确定以灰蓝色的乌云为作品主色调，画面乌云压住船顶，但又有一缕曙光从满天乌云中射出，作品两侧着亮光和暖色，预示着中国革命的曙光。通过色彩、构图、笔触等绘画要素既给人以美的感受，表达出人们的憧憬与期盼，又直观、鲜明地传达了真实的历史讯息，令人信服。

二、紧贴历史主线，以“史作”话史实，激发奋进斗志

在百年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阶段，都曾产生过一些艺术作品，这些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佳作，已经成为那个时期的历史符号，可谓“史作”。美术史作的运用是党史馆的又一特色。

在民族抗战展区，除历史图片、武器装备、文件手稿等物品外，具有鲜明抗战时期特色的木版画成为展览中的一大亮点。陈铁耕1938年创作的《送郎上前线》，彦涵1940年创作的《保卫家乡》、古元1943年创作的《拥护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军队》等一大批作品，内容上展现军民争先向前、英勇抗战，形式上呈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特艺术表达方式，既鼓舞士气，又切近民心。这些木刻佳作，在当时极大地起到‘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’的作用。在展馆中，将观众带入当年的氛围，令人真切感受到抗战时期全国军民团结一心、共御外侮的民族精神，有助于激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的勇气与斗志。

三、“技”“艺”有机结合，唤醒集体记忆，筑牢初心使命

党史馆注重新技术的运用，将新技术与艺术有机结合，为观众打造出幻境空间与时空穿越，升华艺术感染力，给

党史展览带来传统艺术形式无法呈现的全新效果。

长征主题“4D+6面”全景影院是这一形式的典型代表。展场通过6面LED屏幕全景式环境，营造出裸眼3D的视觉冲击力，同时，配合爬雪山、过草地等画面智能控制风吹、冷气等感官刺激，可立体直观还原长征场景，使观众身临其境般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辛、悲壮与英勇。伴随着片尾《过雪山草地》的经典旋律，配合《七律·长征》的诗句，令观众在视听、触感、记忆等多个层面被全面激发，能超乎寻常地领略到‘革命理想高于天’的境界与气概，能更深刻地牢记初心。

“飞越中国影院”则让观众亲历现代时空穿越。人们在驾驶舱中可飞越祖国的壮美河山，瞻仰革命圣地、俯瞰现代中国，身临其境般地感知国家重大项目与工程，感受‘上九天揽月、下五洋捉鳖’照进现实，感悟新时代实现中国梦的伟大过程，能更深刻地铭记伟大使命。

四、标记时代音符，展现精神谱系，弘扬中国精神

百年党史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，是百年党史之魂。用艺术生动地呈现这一精神谱系，是党史馆的又一杰作。

走进不同展区，党史上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旋律就会响起。这些音乐作品多以中国传统的五声调式为主进行创作，借鉴大量民间音乐旋律，它们或高昂，或低沉，或悲壮，或悠扬，这些具有浓郁民族风格、时代与地域特征的作品，与场景、形象、故事相融，能即刻将观众带入‘当下’的境界。从《长征组歌》到《东方红》，从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

《春天的故事》到《新的天地》《强军战歌》，这些观众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飘荡在展厅，引领观众深刻感悟建党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抗战精神、抗美援朝精神、雷锋精神、改革开放精神、女排精神、脱贫攻坚精神、抗疫精神……音乐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伟大精神串联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道虽无形却真切感知的中国精神之脉。用旋律呈现了伟大的中国精神，呈现了党团结带领人民站起来、富起来、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，呈现了党所拥有的强大精神力量。

雕塑作品在党史馆呈现党的精神力量与非凡历史中占有突出位置。从宏大叙事到细节表现，诸多佳作作为党史展览作出了独特贡献。从广场上标识方向与力量的大型党雕雕塑《旗帜》，对应‘四个伟大’主题的《信仰》《伟业》《攻坚》《追梦》四部组雕，到展馆内以《艰苦岁月》为代表的诸多红色经典作品，雕塑在百年党史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

为历史存正气，为世人弘美德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：“社会主义文艺，从本质上讲，就是人民的文艺。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，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。”党史馆充分展示了历史文化之美、红色文化之美、社会主义建设之美、改革创新之美、民族伟大复兴逐梦之美，是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、体现中华文化精神、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的重要场所。“以美育人、以文化人”，党史馆在引导人们感悟信仰之美、精神之美、理想之美，形成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审美取向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体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。

（作者单位系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）

2019年清明假期结束，我与父亲告别后回到济南，没有料到那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。

我自八岁起跟随父亲去他任教的学校读书，那年四十二岁的他不会骑自行车，我们爷儿俩总是沿着沟渠阔步疾行，碧草萋萋，天高地迥。现在想来也不过三四公里的路，那时却感觉特别长，杂识丰富的他边走边和我闲侃各路逸闻掌故。

父亲刚去世那几天，爱人数次安慰我：“老人家一辈子挺不容易，但是走的时候没有痛苦，也是天意。”

父亲一生确实不易，幼年失怙，工作颇多坎坷，智商极高而无处施展，平生光耀大约都在读书时段用尽了。父亲曾不无骄傲地告诉儿女们，那时文理不分科，所以他本想报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，在班主任劝告下改报山大物理系。他经常对我讲述他的母校多么辉煌，其实他不过是母校最不辉煌的校友，在他如数家珍的讲述中，现实中沉到底层的他内心藏着难以言说的心酸苦楚——年幼的我哪里能品出？父亲虽然学物理出身，但动手能力不强，连灯泡都不大敢换，所以我的手脚笨有渊源，而智商远不及他。

即将升入大三时，他因病休学。病愈之后，自然应该复学。他读初中时的校长正在筹建一所中学，也就是现在的沾化一中。在老师的建议下，他没有选择复学，而是做了一名中学老师，这次选择也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。四年之后，清理社会招聘“闲散人员”，他因为不是从学校分配而来，不幸列入其中，工作丢了，被迁回农村，成为一个纯粹的农民。父亲去世的第二天，大姐提起父亲早年的照片，看上去很儒雅，极帅气——照片找不到了，我想也许那才是父亲心中他自己应有的样貌。

跌落到尘土中，父亲彻底失望了。中间有多次出来工作的机会，他都拒绝了。一直到三十八岁时，才重新走上讲台。然而他的心气心力都下降了，开始劣劣质拙，嗜酒，而量不大，饮少辄醉。印象里他经常和一位青岛籍的医生叔叔一起喝酒，医生是老五福，分配到基层，正在闹离婚，妻子不让他见儿子，所以他喜欢逗我玩儿。父亲后来和校长相处得不愉快，自己请求从县一中到一所小学任教。多年后我在县一中（原二中）任教时，遇到那位校长，一个小老头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“当年是我把你爸爸调到一中的。”我也礼貌地狡辩地报之以“呵呵”，因为这些问题原本没有绝对的对错是非，究竟怪谁呢？岁月无敌，谁也别怪。有人觉得父亲教小学可惜，又把他调到一所乡镇初中任教。从小学二年级我就跟着他读书，一直跟到初中毕业，整整七年。某年，一直教物理、数学的他觉得学校安排教我们语文的老师实在不堪，就申请教了我们一年语文。

父亲的工作生涯就这样消磨了。那时他几乎没有主动选择的可能性；即使有，因为没有人指点，自己感性，性格偏弱，所以日子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。他教高中那两年，适逢恢复高考，他教高中时的老学生纷纷到小学找他讨教，晚上时常挤满村小逼仄的办公室。有时我半夜醒来，睡眼朦胧中，还看到他不厌其烦地讲解。他某次参加县里的备课会，主讲的教研室副主任是当地的数学大王，是他当年的学生。老学生首先对台下老师说，今天我老师也在这里，如果我讲不明白，请向我老师请教。然后恭送他回宿舍休息。然而他又还能做什么呢？他内心滋味如何？我以前很少想，也没有和他交流，现在想想我这个做儿子的从来没有仔细体察过父亲内心的甘苦。我读二年级时，他买了一本类似“趣味数学”的课外书，找出一道题，说数学大师高斯有一种简捷的算法，然后开始测试我。然而他失望了，他的儿子不是高斯。

父亲和岳父都做了一辈子老师，他们的学生有一些在本地是“人物”，当然更多的是普通人，他们和学生的关系都是那么淳朴、简单、原生态、不假雕琢，今已经做了三十多年教师的我极为羡慕。有一段时间，县里一、二中的校长都是父亲的学生；一次我去县一中，两位副校长也都是他的学生。我和校长师兄开玩笑说，那时你班主任

叫你们家吃饭，还喝酒，明显违纪。师兄说，我们还给你家干过农活呢。言罢，一起纵声大笑。和父亲告别时，师兄来得很晚。妻子说，他走得很慢，多次停步凝视自己的老师，忍不住抽泣……还有几位八十岁左右的老学生也特地赶来，白发苍苍，一起躬身与他们的老师道别。

父亲年轻时有不少朋友。他喜欢给别人帮忙，能力不逮也帮人家跑跑腿。他的一位老同学来仕途看好，不料突然患病，从此不如意。父亲读大学时，没有路费，同学拿出一个月的工资赠他。父亲记了一辈子，但是友情从来无须偿还。他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，也是远亲，我们称呼三叔，是国内半导体研究的权威，参与过共和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究。他们友谊甚笃，胜过兄弟。三叔因为从事尖端研究，父母去世时，都没有回来，父亲为此忙前忙后，不敢懈怠。那年初，三叔辞世，三婶专门转达信息。本来说好瞒着父亲，不知道怎么被他知道了，老人家放声大哭，情绪无法控制，完全像个孩子，从那时都郁郁寡欢，一直到去世。

父亲喜欢听京剧，老家在旧县城，所以他自小就开始听。上大学时在青岛，看过梅兰芳、荀慧生、杨宝森诸大师暮年的现场演出。当时言菊朋的公子言少朋、儿媳张少楼在青岛京剧团，所以他多次看过他们的演出。他很早就告诉我，言少朋本是马连良的高徒，宗马派，后来言派式微，在马少波劝告下，改唱言派。我小时候耳音好，听收音机凭音色辨识各路名家十拿九稳。父亲常在他的酒友面前显摆，长辈们喝酒时也常逗我猜“角儿”，八九岁的我不高兴时常常不捧场。读师范后，因为没有升学压力，我开始囫圇吞枣遍读鲁迅，受其影响，叛逆年龄的我开始批判京剧的正统气、宫廷气、腐朽气。父亲和我谈京剧，我就开始抡白他。步入中年后，也会为父亲买京剧方面的书籍，齐如山、包拯庭、丁秉铎、吴小如、翁偶虹、欧阳中石诸先生的书都买过，父亲视若至宝，时时研读。他最爱马派艺术，马先生的优点、缺点在他那里都是优点。我自认为比父亲高明，有时反驳他，他也从不介意，依旧是马派铁粉。母亲常说，我最像父亲，在一起净说“没用的”。其实父亲对京剧的挚爱，是他在匮乏年代保留的一块精神自留地，终其一生，他都小心翼翼地呵护着。

父亲去世后，我找出马连良的一本传记和父亲的一些衣物一起焚化。马先生《惜东风》里唱：“一阵风，留下了千古绝唱。”一缕风起，但愿国剧的博大精深、活色生香能让父亲在另一个世界里不孤苦。

和父亲最后告别，司仪让儿女们为父亲祈祷。泪眼婆娑中，我只祈愿，父亲在另一个世界，能够像他自己所希望的样子活着。

（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）

文化周末

第209期

◎杏坛文苑